

LIANGQICHAO SIXIANG DE BIAN YU CHANG

梁启超思想的 “变”与“常” (1898—1906)

邱丹丹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项目“梁启超《节本明儒学案》整理与研究”成果，教古字〔2014〕136号

梁启超思想的“变”与“常”

（1898—1906）

邱丹丹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思想的“变”与“常”：1898~1906 / 邱丹丹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206-12025-1

I. ①梁…

II. ①邱…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思想评论

IV. ①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2248号

梁启超思想的“变”与“常”：1898~1906

著 者：邱丹丹

责任编辑：郭雪飞

封面设计：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中海彩印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3.5

字 数：16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2025-1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触摸、体会、品味、探讨梁启超，缘于偶然。偶然在书店接触到梁启超为李鸿章作的传记，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充满着作者的赞叹、惋惜和同情。让人不禁心生疑惑：这还是那个曾经筹划暗杀过李合肥的梁启超吗？这还是那个“变法”失败被清廷通缉的梁启超吗？二人的关系不应该是势如水火吗？如他自己所说，“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带着这样的疑问，仔细翻阅史料，越去深究，就越发现，梁启超本人就如他的文字一般，似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你去探究。我是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出身，尽管如此，从选定梁启超作为题目到阅读与梁启超有关的书籍，从品味梁启超的人生经历到动笔写作梁启超多变的思想，并不是行云流水、如履平地，其中的不易和点滴发现的喜悦，五味杂陈，个中的滋味，只有在这一刻才能深深的体会和回味。梁启超是一个思想复杂、多于变化的人，翻阅他的人生经历，细读他的思想著作，“善变”的感受总是如影随形。舍弃训诂致力经世之学是“变”，退出学海堂投身万木草堂是“变”，置疑改良倾向革命是“变”，抨击革命回归改良也是“变”，他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然而，他的“变”又不是毫无章法的，总是跟着时代、时局的变迁悄然而生，变得应时，变得其所，他严格执行着自己的人生格言：“切勿犹疑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时常设想，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维新时怎样的意气风发，流亡时怎样的怆然悲愤，波士顿

演讲时怎样的激情澎湃，回国时怎样的憧憬渴望，清华讲学时怎样的精彩磅礴。“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由于学识的有限，想要书写这样一个充满精神活力的梁启超，并非易事，特别是剖析他的“善变”，倍感艰难，时常思路断扼，陷入混沌。

所幸，在写作中始终有恩师的点拨与照拂。拜读在韩东育先生门下，我是幸运的，先生身上有很多的光环，东京大学博士、博士后，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数十篇发表于《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思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读书》等高端学术刊物的论文……而先生身上却从没有“大人物”式的难以亲近。“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先生学识广博，宽厚待人，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让人感到敬佩。在学术上，先生与我的每次谈话，都有很多睿智的地方，对我有很大启发。硕士期间，我几乎从未接触过思想史的相关知识，先生将我从一个思想史的门外汉引入此领域，并结合我的实际情况，为我量身订做了这个既属思想史范畴又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密切相关的选题，从论题的选定、学习计划的制订、开题、论文的写作到资格论文的发表，都倾注了先生大量的心血。几年中，先生对我在学术上的悉心教导凝聚成我点点滴滴的进步，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谦和宽容的人生品格，都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间，使我深切的感受到一名良师的人格魅力对于学生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而我惟有继续在学术和人生的道路上孜孜以求，方能报恩师情于万一。

此刻，当我坐在学林中写作这篇自序的时候，心绪难平，感慨万千。流年从指尖缓缓划过，不经意间我来到长春这座城市已经十四载有余了，而在东北师大的求学时光亦有十二载。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历程，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品味这座城市，品味我的大学，品味自身的成长和蜕变。回首几年前，我怀揣着向往而又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了我的博士研究生的学习生涯，向往于学术层面的即将升华，惴惴于专业方向的不小跨越。我的硕士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而今跨入专门史专业的大门，东亚思想史基础知识的薄弱和对日语的不通，使我在专业课的课堂上，时常有无力、艰难和攀爬之感。时值我刚刚参加工作，适应社会、适应工作、撰写教案、备课、听课、

大量的教学任务，特别是孩子出生后，繁琐而忙乱的工作和生活占却了绝大部分的时间，使我的学业更加举步维艰。然而，性格中不服输的劲头和师友和鼓励总是不能允许我向挑战低头，坚持着一步一步缓慢前行，在前行的途中，幸而有我的恩师、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纵有千言万语，此时都融化在心头。

东北师范大学，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历史文化学院，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数十年的东师生活，让我对这片神圣的土地充满了感动与感激之情。然而，再多的感谢也表达不出我内心满溢的情感。寸心难报三春晖，师恩难报，同学情难忘，再多的语言此时此刻也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惟有深深的道一声：“谢谢！”感谢师长，感谢亲友，因为有了你们的关爱和帮助，才使我的求学之路平坦、温暖和充满希望。所有的这一切我都将永远铭记于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生道路如此，学术研究之路亦如此。

谨以此文献给在我成长道路上关爱和帮助过我的所有人。

2015年6月于东师学林

前言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维新变法的领袖，一篇《变法通议》宣告了晚清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的开始；作为一位深度参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结束，他流亡日本期间进行的早期革命宣传甚至间接地影响了辛亥革命；作为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笔耕不辍，留下1100万字的著述，内容涉及政治、史学、哲学、经济、新闻、法律等诸多方面，20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他的影响，如毛泽东、梁漱溟、钱穆、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梁启超可谓中国近三百年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从思想史层面来考察，梁启超是戊戌维新思潮的核心人物，其思想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与康有为的“太有成见”相比，梁启超在思想上显得“太无成见”。这种被康有为批评的“流质善变”也成为梁启超本人思想上的一大特征。梁启超思想上的变化是有迹可循的，即以不变的爱国救国之心为始终，在不断地反思、累积、探索中调整自己思想的选择，包括他的学术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而二者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变化又总是相表里的。是故，本书选取梁启超思想历史中变化最为激烈的一段时间，即1898—1906年为研究断限，以梁启超在此时间断限内政治、学术思想的变迁为研究视点，围绕这些变迁的轨迹展开论证，以期探寻梁启超思想性格中多变、善变背后的深刻原因，以及屡变背后不变的精髓。本

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集中回顾了迄今为止梁启超思想研究的成果和主要观点，总结了研究现状的成绩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对1898—1906年间梁启超思想研究的意义、目标、价值、方法和手段，作出具体规划，尽可能使题目的研究明晰化和具体化。

第二章对1900年以前梁启超的人生历程作简要回顾。一个人幼年时期形成的道德规范和成年后的人生阅历，对其思想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体系和范围中，由于每个独立个体之间有着微妙的个性差异，导致客观历史投射在每个人心目中的影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观念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因此，在深入探讨梁启超的思想理路及成因之前，将人物还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个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可以勾稽并梳理出梁启超思想形成的本源以及后期发生改变的渊源。

第三章选择梁启超一生思想中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即以1898—1906年为时间断限，通过爬梳梁启超的个人经历、与师友的交往活动、著述及往来信件，并对上述资料进行时间上的梳理和逻辑上的总结，阐释这八年间梁启超的四次主要思想变化：一是在政体的选择上，从维新变法时期的推动君主立宪到赴日后主张革命以共和，再到1903年后回归到立宪阵营；二是从“尊孔保教”思想向“尊孔不必保教”思想的转变；三是提出欲救国必先新其民的新民主主张；四是在日本文明史观的影响下，于1902年提出“史学救国”的新思想。

第四章主要围绕梁启超思想的上述四点主要变化，从师承、友人、日本社会思潮的影响、阅历四个角度分析梁启超思想理路的形成原因及思想间的内在联系：一是戊戌时期对康有为思想的师承，以及1900年以后逐渐突破康有为的思想框架走向独立发展的路径；二是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身边有一批志同道合、共研学问的朋友，特别是黄遵宪，他们对梁启超1903年前后两次较大的思想起伏和最后的回归，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三是梁启超在日本生活时期，正值明治维新后期，大量的启蒙思想和思潮广泛地存在于日本社会，这些思想和思潮对梁启超当时的思想变化产生了推动作用；四是1903年梁启超游美洲时，通过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了解，使他

发现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距离，使他原本对民主、共和、革命的坚持发生了严重怀疑、动摇和转移，绝然地放弃了激进的排满革命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的设想，重新回归到开明的君主立宪制的阵营。概言之，伟大的抱负使他一生心系国家，康有为的言传身教使他走上政途，丰富的阅历使他累积学识，友人的规劝使他认真反思，渐增的学术使他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

第五章是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相表里的角度，分析1898—1906年间梁启超政学思想的一致性，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主导并贯穿于梁启超政治思想变化始终的内因，是其对自身所接受的学术理论的不断思考、选择、调整和扬弃的结果。他每一次思想上的改变，都伴随着学术理论的改变，因而其学术思想的改变也必然引发其政治思想的改变，二者是因果关系，相互表里的。

第六章对梁启超思想与中国近现代思想之关联与影响予以概括和总结。1898—1906年间，梁启超思想的这些变化，既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状况复杂而急剧变化的产物，也是梁启超在彷徨中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现实的理论体系的产物，他怀着一颗赤诚不变的爱国之心，数十年求索于中国的繁荣和富强，他的思想几乎影响了那个时代所有的青年人。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学术界对梁启超思想整体的研究	3
二、对梁启超1900年前后思想变化轨迹及其原因的研究	9
第二章 流亡日本之前梁启超的人生历程	17
一、幼年足迹——因循传统，少年及第	17
二、少年问学——师从康氏，奔走维新	20
第三章 1898—1906年梁启超思想的内在理路	28
第一节 政体选择上的两难	29
一、梁启超与革命派的合离	29
二、避革命之名 行革命之实	40
三、游美归来后的思想转变	44

第二节 从“尊孔保教”到“保教非尊孔”	49
一、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孔子观	50
二、赴日后梁启超学术思想的独立发展	57
第三节 流亡日本初期的反思与启蒙：作育新民	64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突破	64
二、由公德向私德的转变	73
三、日本阳明学对其的影响	77
第四节 萌生救国新理念：以《李鸿章》传为例	82
一、新史之作——过渡时代的传记	82
二、新民启智——以史救国的新史学理想	86
三、知人论事——传论结合的新史学文风	89
四、不必问功罪——新史学的史德和史法	93

第四章 1898—1906年梁启超思想演变的原因

第一节 对康有为思想的师承和突破	97
一、“康有为式思想”的形成	98
二、突破康有为的学术藩篱	106
第二节 黄遵宪等友人的督责与劝诫	111
一、敬才与惜才	112
二、黄遵宪影响下两次思想的回归	115
第三节 日本友人及东学的影响	120
一、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的日本观	121
二、流亡时期梁启超思想转变中的日本因素	128
第四节 漫游新大陆的新启发	141

一、对美式共和的失望	142
二、新大陆之行带来的启示	145
第五章 1898—1906年梁启超自身理论的飞跃	149
第一节 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接纳和阐释	149
第二节 面对理论与现实两难的困境	153
第三节 以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国家学说为基础的新理论构建 ...	159
第六章 善变与持守：“彷徨求索”的一生	165
参考文献	169
一、文献类	169
二、专著类	171
三、论文类	176
梁启超生平大事年表	182
梁启超重要著述年表	195

第一章

绪论

学者们在对近代中国思想史划分历史阶段时，把甲午中日战争（1894年）到19世纪末（1900年）划分为戊戌思潮时期。这么短短的几年，却能够占据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因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思想体系，始于戊戌维新变法时期。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局势，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救亡图存为口号，以改革变法为主旨，领导和发动了19世纪末期的一场维新变法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是一次政治上的改革运动，更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

无论从何种角度作观察，在这场维新变法运动之后，改革变法、学习西方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并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维新派们抨击封建君主专制，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为了启迪民智，他们介绍、翻译、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作为一场政治改革运动，戊戌运动是失败的，但作为一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唤起了近代中国人的觉醒，开启近代民主与科学风气之先河，更重要的是，“就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逻辑而言，后来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戊戌思想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①

① 丁守和，郑大华，任菁：《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这场维新运动的倡导者和思想代表，二人由于这场运动而并称为“康梁”，他们的思想构成了戊戌思潮的主体。令人惊讶的是，当考察康有为和梁启超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时，天平明显地倾斜于梁启超，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根本在于“变”与“不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之：‘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①梁启超的这段评论，从学术上和处世上言明了他和康有为的区别：“太有成见”使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过于执着、思想趋于保守，相反，梁启超的“太无成见”使他随着时事的变迁灵活多变。对于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而言，他的伟大之处往往就在于他复杂的性格和活跃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启超的“流质多变”是确定无疑的，他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唤民主共和，他时而主张温和改良，时而力主激烈破坏，他时而主张保教尊孔，时而高呼尊孔不必保教，他时而主张新民启智以求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时而感叹民智未开需要开明专制。他的一生都在这样的矛盾中无法自拔。然而，梁启超的多变和善变不是毫无章法的，在他不断改变的背后，是一颗不变的爱国之心，这个坚定的信念使他总是在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不停地选择自己的最佳定位，并尝试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中国。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学者葛兆光这样定义思想史：“思想史描述的是思想在时间流程中的建构、定形与变异的连续性历史”。^②这句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思想和信仰在历史中是可以被延续的，它们本身固有的核心、生命和价值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而是被异化为一种新的思想一直延续。从这个角度而言，梁启超的思想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从他登上政治舞台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5—66页。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那天开始，至1929年他生命的结束，从来就没有降低过。那么，深化和加强对其思想特征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亦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无法绕行的课题。本书选取梁启超思想历史中变化最为激烈的一段时间，即1898—1906年为研究断限，以梁启超在此时间断限内政治、学术思想的变迁为研究视点，围绕这些变迁的轨迹展开论证，以期探寻梁启超思想性格中多变、善变背后的深刻原因和真相。

梁启超谢世距今已经近百年了，但他作为曾经深度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一直倍受世人关注，特别是他的思想，以其广泛性、多变性和影响的深远性，有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具体的研究成果及情况，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学术界对梁启超思想整体的研究

中国大陆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从时间上大体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研究状况和改革开放前后的研究状况两大类。

1936年，由梁启超的朋友丁文江主持、赵丰田编写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完成初稿，几经修改，1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研究梁启超的必读书。这本书采用梁启超与师友之间的书信700余件，这些书信比公开言论更能真实地反映梁启超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但书中个别书信和文章的系年不太准确，故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对所参考和引用的资料进行了多方考证。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等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下，一些学者出于当时特殊的现实需要，开始越来越多地批判梁启超的思想，甚至完全否定。这一阶段学者们主要是对梁启超所参与的政治活动及其历史功绩进行综合评价。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梁启超除了在戊戌变法时期有进步性之外，其他思想都是不足取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代表专著有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该书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坏破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

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①1949年之后对于梁启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到了思想领域，学者们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热衷于给梁启超进行阶级划分，尽管成果不多，但评价几乎完全是否定的。从1956年一直到“文革”之前，这种倾向越来越严重。到了“文革”时期，大陆方面对于梁启超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此时代表专著几乎没有，只在思想史研究著作中有所涉及，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978年以后，随时政治形势主流趋向的发展和稳定，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有了现代化的新视角，学者们尝试对梁启超的思想理念、实践活动展开新角度、新方法的再认识和再评价，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研究成果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登上了一个高峰。比较早的一批著作有孟祥才、杨希珍的《梁启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王勋敏的《梁启超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吴其昌的《梁启超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朱俊瑞的《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年）等。其中孟祥才、杨希珍的《梁启超》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专著。这本书对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宣传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进步性、由此带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以及对近代文学的贡献都作了积极和肯定的评价，同时也对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时期反对革命的言行进行了否定。从总体上来看，这本书突破了“文革”前后对梁启超进行评价时全盘否定倾向的束缚。再有钟珍维、万发云的《梁启超思想研究》也成书较早，于1986年由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对梁启超思想研究的又一部重要成果。这本书的特点之一是，摒除了改革开放以前极左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干扰，针对长期以来对梁启超评价偏低的问题，给予梁启超的思想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此书的特点之二是，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梁启超的思想，依次对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史学思想、哲学思想、法制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新闻思想和文学思想进行剖析，大体可以反映出梁启超的思想全貌。这本书是上世纪80年代后

^①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页。

期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一部开拓性著作。

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真正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状态的时间，具体来说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大批相关著作，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国民、伦理、教育、文学、学术思想等方面入手，对梁启超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评价。其中代表性的有：《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梁启超评传》及《新论梁启超》。

由戴逸主编、陈鹏鸣著的《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是对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研究比较详细的一本书，在该书中，作者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置于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视野中，以《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等梁启超的学术著作和梁启超与师友^①的交往为切入点，分别研究了梁启超的哲学、政治、经济、史学、文学和教育思想。在讨论师友对梁启超产生的影响时，作者认为康有为使其转变了治学的态度和目的，走上了关心学术、爱国爱民的学术道路，严复和黄遵宪介绍了西方思想，开阔了梁启超的眼界，使他开始批判传统的保守思想，特别是在梁启超由“尊孔保教”向放弃保教转变时，黄遵宪起了很大的规劝作用。这本书的特点是对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介绍部分较多，对其学术思想形成原因的归结，突出强调了师友的影响。

吴廷嘉、沈大德合著的《梁启超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系统地研究了梁启超几乎全部的学术活动，并深度剖析了梁启超的学术活动，将其细化为精华与糟粕，指出其成就与局限，理智地思索梁启超在学术上的影响和贡献。在该书中作者认为，近代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曲折性是对梁启超思想评价不公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长期忽略梁启超作为启蒙学者的本质特征，不断以其所短攻其所长，构成了学界对梁启超学术评价的失真。全书中作者用了科学的态度观察、分析梁启超，又用心灵和感情去理解他，应该说这是学术研究中应有的一种态度。特别是在梁启超同革命派的关系上，作者认为梁启超曾经真心地同革命派交往，对两党的分歧认识也十分清楚，但来自康有为的压力使他在口号和理论宣传上显得似是而

① 陈鹏鸣考察的师友包括：康有为、严复、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和胡适。